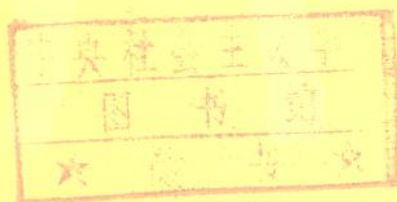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四十五辑

- 我的漫画生涯(上) 李滨声
- 记启功先生二三事 李振生
- 记古钱学家郑家相 郑舜华
- 京剧班旧制习俗百题 王叔养
- 书林散叶 雷梦水
- 密云水库的移民安置 王敬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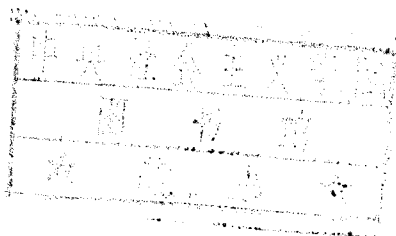
北 京 出 版 社

83741

1271
2:3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WENSHI ZILIAO XUANBIAN

第四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广益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14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680

ISBN 7-200-01829-5/K·180

定价: 4.35 元

我的漫画生涯(上)	李滨声 (1)
京华琐记四篇	刘叶秋 (44)
追随冯玉祥先生的回忆片断	李百年 (60)
冯玉祥将军史料数则	齐 生 (68)
血洒疆场, 英灵永在	赵润东 (85)
——记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将军	
张大千在北平的片断回忆	王振中 (91)
记启功先生二三事	李振生 (100)
齐派艺术的传人——娄师白	王雪光 (107)
记古钱学家郑家相	郑舜华 (113)
记藏书家姒兼山先生	雷梦水 (126)
王莹在北京	张文玲 (129)
京剧班旧制习俗百题	王叔养 (142)
追忆名伶孟小冬	王叔养 (172)
忆菊朋夫人谈汉调戏班	李克非 (177)

2005/6

北京戏园的变迁	张笑侠 (181)
大众剧场话沧桑	侯希三 (185)
书林散叶	雷梦水 (226)
琉璃厂的古玩业	石 朱 (237)
崇文税关	沈信夫 (256)
密云水库的移民安置.....	刘梦昆 郑云奇 王敬魁 (261)
昌平五峰山庆王坟简史	张志良 (270)
北京的西医西药业	阎少青 (284)

我的漫画生涯(上)

李滨声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总把思绪带回到许久以前。我这照片摄于1952年一元复始的农历正月。同年的秋天，也就是在《北京日报》创刊的日子里，我奉调来到新闻岗位上，算来整整度过了36个春秋。

在这既漫长又短暂的36年中，我曾三进《北京日报》。“始”与“终”是正常的，“始”是因工作需要，从美术专业调到新闻岗位上来；“终”是年满60，又超龄二载，新陈代谢，办了离休手续。此外的两出两进，就是历史的误会所安排的了。



照片作者自注：此照摄于1952年春。同年国庆后调《北京日报》。此照原背面有当年自己题写的“我们是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字样(系按一苏联招贴画标题写的)。不料几年以后成右派了。

(一)

新生活

1952年10月初，我被调到《北京日报》做美术编辑，主要任务就是美化版面和偶尔为新闻稿配个插图。从此离开了雕塑台和调色板，工作需要攻克“黑白艺术”，变化不小。

当时的《北京日报》，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美术编辑。过了没有三五天，方成同志就正式调《人民日报》去上全班了（此前他戴俩“牌”——50年代机关工作人员都佩戴单位徽章——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两处分上下午上班）。方成走了以后，只剩下我和骆拓同志两个人，另有一名摄影记者冯文岗同志住宿在美术组的办公室，也只是朝夕相见，未免有些孤零零的感觉。当时“美术组”并无正名，附属在文化生活部，与摄影组（实际也仅一人）同被戏称为新闻队伍中的“少数民族”。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不大安心。我原是美术专业创作人员，比较擅长漫画和雕塑。在调到《北京日报》的前夕，我正在完成一项自诩荣耀的创作任务——1952年10月“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当时为配合宣传，拟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大戟门前的广场建造一座巨型雕塑——会议的吉祥物“和平鸽”。这一任务由市总工会文教部分配给我后，我参照毕加索的“和平鸽”进行了构思设计、施工雕塑，在高高的底座四周，分别浮雕装饰图案“缠枝橄榄叶”和四种文字的“和平”字样。

雕塑落成，参观的人很多，新华社还拍了新闻照片，自己自然引以为荣。当时我已完成任务到《北京日报》报到上班了，首先

请《北京日报》开了介绍信去新华图片社印了放大片送回原来工作的单位——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希望领导考虑还是让我继续雕塑专业、回原单位工作。结果，除约我回去谈过一次话、帮助一番之外，就再无下文了。就这样，在一点思想基础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了我的新闻工作生涯。

良 师

50年代的干部，组织观念特别强，连我这个人打算较多的人也不例外。尤其是经过党团员们的帮助，我渐渐安下心来，并表示愿意为新闻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

俗话说得好：“卖什么吆喝什么；干什么得像什么。”于是，我也就开始按部就班学起有关新闻的业务来。从什么是新闻要素，新闻有几要素，……循序渐进。

在这方面，乃至以后开拓“内部讽刺漫画”的局面，我受老报人左笑鸿先生教诲良深。左先生学问渊博、见识广阔，人们都尊称他左公。据悉，他在旧社会有过不少著作，是某报的主编。由于是留用人员，按例限制利用改造，所以级别职务都不高。记得50年代，左笑鸿先生一直是“助理编辑”，除起着顾问作用以外，只分配他做划版样和编周末版“俱乐部”栏的谜语等工作。

左笑鸿先生常鼓励我随文字记者一道去采访。回来后，文字记者根据采访记录总是“轻而易举”地写出了报道，而美术记者如何发挥作用呢？画连环画与文字稿势必重复，再说版面也不容许；画单幅画再现采访中的可视形象又与新闻摄影雷同，何况绘画是“手工劳作”，与摄影的“机械化”根本无法争雄；比较现实一

点，就是画插图，可自己又不完全心甘情愿，总觉得有时插图纯属附庸。

后来，左笑鸿先生启发我说：“地方报纸应有地方特色，报纸美术也不例外，宜发挥自己专长。”指引我寻找自身的出路。

探 索

鉴于当时各报刊上只有以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的单一画种“时事漫画”（亦称“国际漫画”或“政治讽刺画”），而人民内部矛盾无人问津（以绘画形式）的情况，我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通过艺术形象去批评解决呢？我把这个设想对左笑鸿先生谈了，并向他请教。左笑鸿先生很谨慎，未直接表示可否，但鼓励我“不妨试试看”。

我开始探索着，从读者来信中去寻找可作试点的好材料。记得有一次读者来信反映打击报复揭发检举人的严重情况，我便据此试画了一幅漫画，经过争取终于见报。那画面上是一人手持一信正待往“读者来信”箱里投，不料身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手抡“大帽子”把投信人扣住。帽子上写着“无组织、无纪律”。这幅画见报后，得到社内外一致首肯。因为“扣大帽子”这样的言喻虽然早有，如今通过形象化更深化了主题，为读者喜闻乐见。这幅画是以实事为根据的，但姑隐其名，也符合对待内部矛盾的“与人为善”的精神。就这样，在《北京日报》上开始了内部讽刺漫画的纪元。

相继探索漫画题材，可画的尤多，社会道德问题就大有可画。50年代我画了不少这方面题材的漫画，社会效益一般都是

良好的。

那幅《满不在乎》，讽刺在公共汽车上，一个胖男人坐在“孕妇席”不给孕妇让座。此画见报后曾在报社内引起一段插曲，因为那画中人（不让座的胖男人）形象被一位报社的同志自己“对号”，非说画的是他不可，从而提出抗议。我再三解释，左笑鸿先生也从旁劝解，风波才算平息。

事后左笑鸿先生指出，从生理上夸张不让座的人体胖是失策的，因无必然联系。

这是创作内部讽刺漫画开始遇到的一次麻烦，引以为训，以后的道路才平坦起来。

《喧宾夺主》是讽刺在剧场肆意纵谈，影响台上演唱，气得“诸葛亮”说了话：“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这画是我50年代的代表作，也是个人第一册漫画集的封面画和书名。

提起《喧宾夺主》的创作成功，与左笑鸿先生的指导也是分不开的。记得原始的草稿，设计是在电影院里，通过当时正在首映的影片《智取华山》的惊险镜头做文章，让银幕上正在攀登华山的战士指问那在高谈阔论的观众：“看我的，还是听你的？”经左笑鸿先生建议，把环境改为剧场，由正在演《斩马谡》的诸葛亮提出指问：“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使《喧宾夺主》得到了升华。

《我的大金星怎么又漏水了？》并非讽刺金星笔质量有什么问题，而是通过当时人们对文具中的俏货“大金星”的钟爱与不爱惜公物的矛盾，用形象对比揭露画中人的自私的心理状态。尽管标题突出了“大金星”，并无副作用。大金星厂也不多心来找麻烦。一来主题明显，二来可能误解的方面先设了“防”，在画面有意安排了菊花的补景，用意规定时令是冷天，那么钢笔偶然漏水也不

足为奇。

《夜行的故事》是针对当时大街小巷路灯尚未普及，夜晚骑自行车必然点灯才保平安而画的一组四格漫画。后来被改编为相声，广为流传。

讽刺的功能

内部讽刺漫画在《北京日报》上扎下了根，在广大的读者当中得到了支持。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我又把内部讽刺漫画的触角进一步向前伸展，开始对生产质量奇差的厂家进行点名批评讽刺。

《大宝，这铅笔在哪儿买的，真棒！》画一位老奶奶拿着三星牌铅笔，边纳底子边和孙子说话，借以讽刺那笔芯其硬无比。

《鸣谢》是根据读者来访，主诉被“幸福”牌竹套暖水瓶爆炸烫伤脸部的事实（同时带来诊断书和残破的暖水瓶为证）创作的漫画。我甚至没有向厂方核实，就画了《鸣谢》（“感谢”“幸福”带来的“幸福”）见报。事后该厂向受害者道歉、赔款并负责医药费，整顿生产直至转产，后来变为一个比较先进的厂。

寓庄于谐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漫画上止于揭露问题是不够的，绝不可少了幽默。但幽默与滑稽的界线是模糊的，掌握不准，效果就可能出问题。在具体的题材上有时真犯难。

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来访，头上裹着纱巾，严严的。原来她在八面槽孔雀理发厅烫发，结果被烫掉一绺头发，还灼伤皮肤一大块。主诉之后解开纱巾让我看，真是滑稽极了：除了贴着纱布的部位以外，好大一片焦糊的短发茬仿佛刚割过的麦地，特别

是涂的紫药水干后泛着金光十分可笑。再看那女同志的怨愁情绪，又使人感到同情和义愤。

这是个难处理的课题。这样对顾客不负责任的理发店、理发员难道不该狠狠挖苦、讽刺吗？那女同志被烫得那么丑，不该展示出来让大家评评理吗？可是形象化起来都有问题。想来想去，最后舍去烫发现场，画了两位年轻姑娘在对话：第一图，甲从一侧指着乙的“波浪大花”（当时新潮）发型夸奖说：“小王，孔雀理发厅烫的就是漂亮。”第二图，乙转过脸去，露出烫掉头发贴着纱布的光秃一片说：“你不能片面看问题。”

问题揭露清楚了，为受屈的女同志鸣了不平，让那理发厅去接受正义的谴责吧！这比从形象上去丑化更有力量。

亦 赞 亦 颂

漫画主要功能是讽刺，遇适当的题材，也可用于歌颂。在这方面我也做过努力。过去有人说我是“以讽刺作职业的人”，错了，我也歌颂。而且有的作品，如《奶奶和孙女》还获过“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那是1958年的事，当时我早已被错划右派，作品是反右以前北京市美展送交全国参展的，只允许参展、评奖，结果也通知到人，但不发奖，连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选集时把我的名字也圈上了黑框）。

歌颂性漫画我还真画过不少，其中也不乏“打得响”的，不避“老王”之嫌，还想表述几句。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从侧面歌颂了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画的是节日前夕，一位邮工取信，打开信筒的门，拥出的所有信封

上都是“最可爱的人”。这画标题是《每逢佳节倍思亲》。

画歌颂性漫画是正面宣扬社会主义好；画讽刺性漫画，殊途同归，目的也是宣扬社会主义好。从辩证观点去看，讽刺落后就是歌颂先进；指出错的，剩下的就是对的。就在我本着这一信念，亦步亦趋地紧跟党的宣传方针，脚踏实地地迈进着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

“列 席”

1957年春天，北京市党的宣传工作会议在公安部礼堂召开。正式代表以外，还吸收不少党外的人作为“列席”参加。《北京日报》也有名额，是我和从维熙两个青年。

会上听取了有关报告，还阅读到大会发的一些文件材料，包括流沙河的《草木篇》等“大毒草”。分组讨论和“鸣放”，我们文化口是在市文化局。我和启功、徐燕荪先生在一个大组。徐燕荪先生的发言，当时大家都觉得言辞有过激的地方，如他为一些知名度较小的老国画家“鸣放”时说，有些老画家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画点“书签”和“灯片”糊口（其实当时国画普遍不景气，齐白石的四尺三开画不过20元）。画了一辈子画，成就不小，可是加入不了“全国美术家协会”（50年代中国美术家协会只有全国一级组织，吸收会员十分严格）。徐先生慷慨陈词，要美术界自办地方美协，“与全国美协分庭抗礼”。徐燕荪的发言使四座惊讶：怎么能自办美协呢！记得启功先生当场还对徐燕荪先生进行劝告，大致意思是有什么意见都可向党建议，宜冷静畅所欲言，不可激动。当天的会结束时，主持会的领导作了小结，同时对启功先生

的发言还特别嘉许几句。事隔不久，启功先生也被戴上右派帽子。

这次“鸣放”会上，我在文艺方面没什么错误言论，只是在农业合作化的看法上直言了自己的观点，主张不可过急。后来反右斗争开始，我因漫画《没嘴的人》被揪出来，一经清算，挖出早有右派言论，作为重要罪行一条，写在结论上装入档案。

回想我和启功先生一样，都没有造次，比较顺利地通过了“鸣放”关，可万没想到还是暴露了“右派本质”，被戴上“帽子”，这正合着那句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没嘴的人》

50年代有本理论刊物名叫《学习》，大概就是后来的《红旗》杂志。1957年的春夏之际，该刊忽然与我联系，来车把我接到沙滩该刊编辑部，在便餐的桌上向我组稿，大意是为配合“鸣放”，理论刊物也要增设漫画栏目，活跃版面。要我画点针砭时弊的漫画在该刊发表。除口头介绍一些素材，还提供几则剪报资料。

几天以后，我画成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正襟危坐的干部模样的人，面部眼、眉、耳、鼻全有，独没有嘴，双手捧着一个获得的奖状。标题为“没嘴的人”。这画没有寄出，本单位的同事谁看了都说好，总编室主任老陆也认为不错，并决定要在本报（《北京日报》）提前发表。于是没过三两天就见报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时隔不久，忽然一天晚上10点多钟有人叫门，是上夜班的美术组同志传呼我马上到总编室去。我以为有临时任务，匆忙赶到报社。老陆温和地向我讲了反右派斗争的意义和当前的形势，

并说作为革命者应该不怕批评，然后才拿出一张明天将要见报的“小样”——一篇揭发《没嘴的人》是“大毒草”，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无言论自由”的文章。文章作者署名为“成美”。老陆进一步向我解释说：“成美是人民大学在本报的实习生，问题是由客观揭发出来的，怕你没有精神准备，特先交底以免意外。”一时间，我除了感谢组织照顾外，不知如何是好，意识到反右派斗争的风雨，马上就要落到自己头上了。

果然没过两天，我就被当作右派揪出来了。紧接着是轮流批斗。我被指控的右派罪状，主要是漫画中的问题，包括漫画中对戏曲改革所持的保守观点。同时，有人揭发我平时唱过的京剧戏词中有“龙潜沙滩”等极端“反动”的内容，明显对现实不满。更有甚者，《击鼓骂曹》中祢衡有句唱词是“掌中缺少杀人的刀”，经过联系推理，断定正是我的反动思想的写照。偏偏又有本组同事说我办公桌抽屉里就有把刀。揭发会上群情更加激愤，我被押着去美术组，由办公桌里起出了那把刀，原来是件银镶玳瑁鞘，附有一双象牙筷子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工艺品，平时我用做餐具的。然而不由分说，既有了刀，势必就要审问要杀谁？这意外的性质升级，使这次斗争会演变成一场闹剧。

1957年反右斗争基本上还是文斗，只有“喷气式”^①的体罚，我挺不过，同时在声讨气势的压力下，不得不招认，胡说要杀王复羊。平时王复羊与我关系最好，说要杀王复羊，谁也不相信，人们指责我狡猾。在一再逼供下，我依次说要杀骆拓、郑熹、陈今言。这几个人都是美术组的同事，平时和我关系也都不错，况

① “喷气式”是一种变相体罚，要求低头弯腰两臂向后高举，摹仿喷气式飞机俯冲之式，故名。

且这些人“鸣放”中都有“右派”言论，有的已被点名，迟早就要被揪出来；我所供的哪里会被认为是真的呢？当追问为什么要杀这些人时，我回答：“同行是冤家。”但根本无效，继续受到逼供。因为“喷气式”站在大会的台前，头被迫得越低越深，正好看见背后主持大会的老陆，我在实在无可回答的情况下便顺口开河说：“我要杀老陆！”老陆大概出于意外，听到这无稽之谈，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同时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不止，顿时会场大乱。紧接是老陆的咳嗽声，老陆边咳嗽边说：“李滨声很不严肃，首先要整他的态度问题。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当时我的直觉，那咳嗽声无疑是在掩饰抑止不住的笑。

这次大会就如此不了了之了，以后也再没有追问所谓“要杀人”的问题。

十多年后的“文革”期间，这个老问题又被揭发出来。不过这次不是又清算我 1957 年的右派问题，而是外调要我旁证老陆在 1957 年反右斗争大会上为什么发笑，老陆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据实回答与老陆是一般上下级关系，至于斗争会上老陆是否笑了，我不知道，只听见他咳嗽得很厉害。外调人不以为然，又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接着诱供，我因警惕，终未就范。最后外调人没辙，叫我写个情况具结保证事实。我大意写了 1957 年 8 月 10 日《北京日报》那场反右斗争大会很激烈，会上口号声一片，又兼当天是大雨天气，窗外雨声很大，因此我只听到在斗争会的高潮中老陆咳嗽得很厉害。此外实在不能证实。

我签了字，还叫我盖了手印，总算过了关。

蒙混过关

反右派斗争日益深入的日子里，北京市第二届人代会召开临时会议，我作为人民代表也被通知参加会议。我们东城区组共有两名“右派分子”，一位是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先生，另一个是我。

我由于被揪出来较早，接受批判教育多，态度有所转变。在这次开会之前，我就准备下了接受批判的材料——印有《没嘴的人》漫画的那张报纸五六份，带到会议上来。采取主动，刚一点名叫我交待罪行，我就把材料拿给大家，并为了表示诚意，特别站起来说：“请求各位代表参照分析批判！”（1957年市人代会议反右斗争在北京饭店分组进行，不要求右派站起来，更不要求“喷气式”。）

李宗恩先生在这次会上表现沉着，一言不发。特别是对跨组批判（有来自别组的代表，也是协和医院的医生，他的学生×××对他揭发批判）更是置若罔闻。相比之下我的态度被认为尚可，在作小结时，主持人说“对李宗恩要继续批判”，“对李滨声要继续帮助”。我听这话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第二天《北京日报》接着召开批斗我的大会。第一位发言的是头一天本报采访人代会的记者同志。他把昨天我在会上主动交代问题和故意站起来假装老实企图蒙混过关的情况向大会作了揭发，马上激起雷鸣般的口号……我昨天晚上所有的高兴一下子全都化为乌有了。